



张朋园 著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翔实，论断公允……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民初政治之“别史”。

—— 萧公权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 张朋园

ISBN 978-7-80720-767-2



9 787807 207672 >

定价：25.00 元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张朋园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 张朋园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7

ISBN 978-7-80720-767-2

I. 梁… II. 张… III. 梁启超 (1873~1929)—思想评论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8615 号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责任编辑: 武 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 100052)

发行电话: 010-63106240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0-767-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萧公权先生序

十三年前，我在张朋园先生大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里曾向他建议另写一书，将梁氏壬子年以后的言行，作同样精密系统的述论。现在张先生果然完成了这一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的佳构。不但我引为荣幸，读者得到这一部研究近代史的要籍想必也会感谢作者。

张先生在“绪论”里说：“本书以梁任公在民国初年的行谊为讨论范围，与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下衔接，权充民国部分之评传。”承他在付印以前，将全稿寄示。细读之后，觉得这一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详实，论断公允，与《清季革命》相较，毫无逊色，并且另有前书不及之处。梁氏壬子以后的言论和行动与民初十几年间政局之动荡，党派之离和，思潮之起伏，以及社会之转变，都密切相关。因此述论梁氏的言行无异同时显示民初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大势。张先生的这书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民初政治的“别史”。

这书优点颇多，读者法眼自能洞照。不揣谫陋，试举一二。例如作者于述论梁氏言论时不但详确地举其内容，并且说明其发生之根源以及转变之背景，于是其历史上的意义，豁然呈露。这可以

说是治思想史的“上乘法”。又如作者述论梁氏的志事，一贯地征实持平，既无顾忌，也不偏袒，遵循史学客观之正规，扫除入主出奴之陋习，誉为良史，当无愧色。

萧公权谨序

1978年1月12日

自序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是萧公权先生给我的题目,迟至今日始勉力完成,虽是愧疚得很,但已如释重负。十三年来,承知友关怀,盼望此书早日问世,其所以姗姗来迟者,实因题目太难和所遭遇困难很多的缘故。题目难,至为明显,所遭遇的困难,已无庸叙述,只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梁任公是一位声名洋溢的知识分子,当其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他有种种理想,一度有志革命,然不旋踵间,转趋温和,认为渐进的改革才是正途。如是者几番改变己见,每一改变,皆能发而为文,洋洋洒洒,“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不知风靡了多少同时代的人物。但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是有着极大距离的。人皆喜于批评握有权力者当如何,而不当如何,然一旦身历其境,或因困于环境,或因理想主观过强,疏忽了客观形势;或因发生逆来的事故阻挠,不但不能遵循理想而行,甚至陷于进退失据的状态,被迫置理想于不顾。政治学者洪庭洞尝谓:革命家喜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改革家则不轻易同时推动多种政策;由于后者难以满足前者的要求,因此被批评无能或保守。然而前者当轴之后,却又发现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是有其限制的,并非事事皆能以激烈手段解决,因此,昔之革命家一变而为保守者,甚至一筹莫展,无所作为。〔1〕

〔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 6.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整个国家大计,直接或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这答案是否允当,朋园不敢自是,仍请方家赐予指正。

本书初稿于七年前草成,承蒙吾师郭廷以先生在体衰中过目指正。萧公权夫子命题在前,复加审阅指教,并承作序谬奖,前辈之爱,谊高云天,除拜感万分之外,并愿我辈后学,应以此师道作为培育人才的范律。廷以师逝世已两年余,人天永隔,报答无由,仰望穹苍,恻怆曷极!萧公权夫子健康如恒,福寿绵绵,更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本书从撰写之日起,至问世之日止,承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李又宁、金承艺、陶晋生诸老友初审指正,秦贤次、康葆延、黄宽重诸先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或提供史料,或补充观念;郑亦芳、刘纪曜、张瑞德、雷慧儿诸同学校读;张宛慧小姐编定索引;美国福特基金会、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支助;食货主人陶希圣不但过目指教,并以其出版社印行,谨在此一一致谢。

岳父母汪宗鲁、聂炳霞大人,视我如子,妻雁秋视我如兄,都鼓励我只管读书,不问家事,我无后顾之忧,而能专心研究教学,这种幸福,诚如佛家所言,真不知几生修来!我不敢言谢,只有继续努力,希望能够为学术界多贡献一份绵力,不辜负他们的愿望。

张朋园 于台湾南港

1978年2月5日

回 归 序

这本小书在外面流浪了 28 年,今天终于回家了。

我在近史所任职期间,一共写了 5 本专刊,4 本纳入所的专刊丛书,只有这本没有被接纳。原因是近史所的前期处于威权时代,白色恐怖使知识分子自我检查,自我设限。回想我的第一本专刊《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稿本完成时,所长郭廷以先生便有所迟疑,想要改动原定的书名,但郭所长是位有担当的学术领导者,最后决定不予更改。《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原是萧公权先生所定的书名,四平八稳,但那时当家的王聿均所长将稿本搁置了三年之久,才说:“我担当不起,我不能出版它。”这就是它成了孤儿流浪在外的由来。

本书流浪的前期获得食货出版社的收容。食货主人陶希圣先生获悉书稿被拒,为之阅读一通。他认为没有不妥之处,食货可以印行出版,就这样该书有了栖身之地。1978 年本书问世,不仅没有遭遇困难,而且成为 1979 年台湾十五大畅销书之一,甚受好评。食货曾经二度重印,及至陶希圣先生过世,食货也歇业了,本书的流浪才真正开始。食货歇业后便没有人收留它,渐渐在市面上消失。我不时接到询问电话,问何处可以购得。既然还有人喜欢它,我只有出点钱影印数百本应景,时在 1992 年。

自己的著作,有如自己的子女,实不忍任何一人流落在外。本书与《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原是姊妹之作,

互相连贯,没有拆散她们的理由。我今已是耄耋之年。我自己是吃近史所奶水长大的,近四十年研究写作,除了拿薪水,还得到基金会的补助。饮水思源,属于近史所的,应该还给近史所。感谢现任所长陈永发先生、副所长张力先生,他们同情我的感受,经过常设的学术审查制度,将本书纳入近史所的专刊系列。它回家了,它不再流浪,我是多么高兴!

回到了家,沐浴更衣,焕然一新:新版本以计算机打字排印,改正了旧版的错误。张力副所长不仅费心安排本书的回归,而且详为阅读一遍,改正了学术规格上的种种缺失,出版组张珍琳小姐一手处理版面更新,使本书俨然一个新时代的小伙子,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

2006年4月1日

目 录

萧公权先生序	1
自序	1
回归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共和建设之道——梁启超的政治理论基础	6
(一) 拥护共和	6
(二) 强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	10
(三) 中坚阶级领导：政党内阁与二院制	16
第二章 政党政治——梁启超与进步党和国民党	22
(一) 进步党之组成与兴衰	22
1. 组党之议与结合各派	22
2. 三党合并为进步党	27
3. 梁启超在进步党中的领导地位及领导方式	28
4. 梁启超与进步党的兴衰	31
(二) 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隔阂和冲突	36
1. 梁启超与国民党的隔阂和仇视	37
2. 两党的正面冲突	40
3. 对抗国民党的策略	43
4. 两党调和与携手的可能性	46

5. 两败俱伤的恶果	52
第三章 中坚领导——梁启超与袁世凯及北洋军人的关系	55
(一) 从联袁到讨袁：维护共和	55
1. 梁袁关系	56
2. 从劝说到反抗	60
3. 反袁的基本理论	63
4. 军务院的构想及善后办法	67
5. 梁蔡反袁的志气	72
(二) 研究系与北洋派之关系	76
1. 梁与段祺瑞的关系	77
2. 梁与冯国璋的关系	79
3. 改造国会的理由	80
4. 研究系之失势	83
第四章 国务大臣——梁启超与民初之财政、司法及外交	89
(一) 财政总长	89
1. 梁与财政关系	90
2. 民初财政之困难与混乱	91
3. 梁的财政政策	92
4. 失败原因	99
(二) 司法总长	105
1. 民初司法状况	105
2. 有理想而无建树	106
3. 改良司法十论之检讨	110
(三) 对德外交	113
1. 外交方针	114
2. 对德外交——从中立到参战	115
3. 卷入外交漩涡	121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梁启超退出政坛后的动向	128
(一) 引论	128

(二) 介绍新知的学会活动	130
1. 共学社	132
2. 讲学社	139
(三) 春风化雨	142
1. 办学	142
2. 讲学	147
第六章 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梁启超欧游之后思想的变化	153
(一)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53
1. 从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说起	153
2.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61
(二) 发展实业——中国走向现代化之道	166
1. 从反对阶级观念和唯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	166
2.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取舍	175
3. 北伐时期的反共态度	182
4. 以发展实业对抗马克思主义	188
第七章 协同动作——梁启超退出官场后的政治生活	193
(一) 五四运动	194
(二) 国民制宪运动	200
(三) 联省自治运动	204
第八章 师友之间——梁启超的人际关系	213
(一) 康梁异趋与万木同学之累	214
1. 康有为	214
2. 万木草堂同学	219
(二) 青出于蓝的后起之秀	224
1. 蒋方震	224
2. 张君勱、张东荪	227
第九章 言论依归——梁启超在民国之言论影响	233
(一) 《庸言》、《大中华》	234

4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1.《庸言》	234
2.《大中华》.....	237
(二)《国民公报》、《晨报》	240
1.《国民公报》.....	240
2.《晨报》	242
(三)《时事新报》、《改造》杂志	244
1.《时事新报》.....	244
2.《改造》杂志	246
结论	252
参考书目	257

绪 论

梁任公于民国元年十月回国,结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当时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为之年,以其戊戌以来所奠定的赫赫声名,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亦正是其时。惟当时的环境,是否容许他一展身手,仍是问题。

民国初年〔1〕的社会有三大特色:第一,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也是旧传统的延续;第二,中央权力由坚强而式微,地方主义逐渐抬头;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国在加速蜕变中。

就第一义而言,民国肇建,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可谓之为新纪元的开始;袁世凯掌握权力,旋即称孤道寡;洪宪帝制平复,宣统复辟随之,这一连串的帝制事变,可谓之为旧传统的延续。但是这新纪元与旧传统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加以伸引。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观察,推翻清朝的两大势力: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同时以政党形式参加权力的角逐。政党为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此亦为开创新纪元之举。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数都是逊清的遗老,他们一部分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一部分则别有打算,他们的思想仍以旧传统为范畴,虽然新思潮已令他们震撼。

因此,在这新旧交错的时代,从开始便是三元竞争的局面。三

〔1〕 在此指北洋时代,自元年至十七年,约与梁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相始终。

元中的新旧人物固然有泾渭之分,革命党与立宪派也有激进与缓进之别。政治权力的分合,往往由连横合纵之运用而变迁。论民初三派人物,革命党与立宪派虽然激烈温和不一,但同时皆以民权政治为理想,应该有相互提携的可能性。立宪派与旧官僚大多有士绅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种限度的妥协余地。难于相合的是革命党与旧官僚,无论渊源或信仰,两者皆属南辕北辙。因此,立宪派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初的权力变化,立宪派实有密切的关系。

三元角逐权力,立宪派选择了旧官僚为妥协的对象,因为旧官僚为实力(军权)在握者;旧官僚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与立宪派联手。但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立宪派与官僚派一新一旧,基本上难于持久合作,一朝旧势力藉立宪派的协助打倒了革命派,则立宪派亦不免遭受排斥。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革命党与立宪派在元、二年分别改组为正式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后不久,先后皆遭到袁世凯之排挤。

民国初年仍是旧势力占上风的时代。代表新潮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失势之后,旧势力一无顾忌,旋即走向反动,袁世凯的称帝似乎早在预料之中;但是,这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返回传统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弱的,激进与温和两派不期而然地联合起来,阻遏逆流,袁氏称帝失败似亦在意料之中。袁世凯死后,旧官僚之中复辟派转而得势。然袁氏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残余势力重心转到段祺瑞身上。段氏与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联合,击溃复辟,是为新旧交替中之又一次激荡。最后段祺瑞又与进步党分裂,旧势力继续控制北京,新势力则酝酿卷土重来。以上是为第一义。

就第二义之中央与地方盛衰而言,当袁世凯的势力占上风时,北京的政权是坚实的。袁世凯堪称为旧时代的最后人才,如果他的行为,不顾强地抗拒新纪元的开展,他的才能必然有助于新旧的交替。当时思想开明的人士,无不寄望袁氏做中国的华盛顿,为民主政治奠基,为万世开太平。如果有华盛顿的雍容气度,国民

党和进步党，一激进，一缓进，未尝不是中国两党政治的好基础。即令排除政党政治，若不称帝，仍然可以坐拥大权，维持统一的局面。民国三至四年之间，全国趋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没有前此的更动频仍，各方面的建设已有逐渐推动的迹象。不幸，洪宪帝制破坏了趋向安定繁荣的机会。

袁世凯死后，旧势力分裂。由于旧势力之互相倾轧，演成军阀的混战局面，加上激进的革命党遭受排斥，南北对峙，中央权力遂由坚实而式微。经直皖、直奉之战，全国糜烂，地方割据主义亦自此嚣张起来。

再就第三义而言，由于中央权力的式微，军阀之忙于互争雄长，思想界得到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这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眼见时局的混乱，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疾首痛心，呼吁救国，各抒所见。他们的思想无论是激烈的、温和的、进取的、保守的，各执其说，有的谈问题，有的谈主义，民主、自由、资本主义、马列主义，都一齐提到了，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这就是五四运动。在周策纵的笔下，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真可谓之为“万花齐放，百家争鸣”。〔1〕

中国的命运大半操诸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推动时代的巨轮，加速其转动。当然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中国的幅员辽阔，南北又是分裂的局面，何处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不仅发为言论，还要付诸行动呢！虽然这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宜妄加价值判断，但显然的，中国即将迈向另一个新的时代。

民国初年的情况如此，梁任公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所作为吗？他是否已经完成了应有的准备呢？

梁任公，举人出身，属于上层的士绅阶级。无论他是否重视这

〔1〕 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15.